

# 框框內外——澳門現代散文研究三十年的 回顧與對話

留婷婷

**[摘要]** 本文以文獻回顧為經，學術觀察、倡議與對話為緯，將過往三十年的澳門散文研究分為“史論”、“專論”及“書評”三類，以期能縱橫交織出此領域研究成果的地貌全景。史論即澳門散文史之鉤沉，僅有始於1950年代、終於1990年代的一家之言。專論為格式嚴明之學術論文，量體與篇目皆次之，主要圍繞着“女性書寫”與“報紙副刊”兩大子題去展開論述。書評則為數最多，擁有大眾、自由、彈性等表徵，既與散文創作聲息相通，也體現出對報刊生態的依賴。在澳門散文創作、批評與論述的各環節或場域中，複數框架的存在皆是不可否認之事實，由是，多維的視角便有提出之必要與實踐之價值。

**[關鍵詞]** 澳門文學 散文研究 報紙副刊 女性書寫 文學場域

## 一、前言：從舞台的形狀談起

對於澳門現代散文研究而言，或許沒有任何時間點是比1981年3月澳門東亞大學（即後來的澳門大學）創立、1983年6月《澳門日報》的純文藝副刊“鏡海”版創刊，以及1986年1月3日至1月6日，由東亞大學中文學會所主辦的“澳門文學座談會”於澳門日報出版社的會議廳正式登場，來得更具有代表性與象徵性的了。“‘鏡海’創刊初期，所刊作品，有不少出自東亞大學師生手筆。這些作品，後來結集，都收在《澳門文學創作叢書》中，由中文學會在1985年出版”——<sup>①</sup>東亞大學的建置，為澳門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培育了最早期的一批人才；《澳門日報》“鏡海”版的開設，則為有志於此的青年學子，提供了文字發表的平台與文學交流的場域，兩者相輔相成。而在累積一定的創作成果之後，研究工作也旋即起步。從1984年在“港澳作家座談會”中，僅能附議成名於香港的詩人韓牧之呼籲，思考“澳門文學的形象”應當如何構成，到1986年的“澳門文學座談會”裏，終於能夠提出立足於本土的觀察與意見，實現了由外而內、由報刊媒介到學術場域，也由書寫者至研究者的多層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以及典律化（canonization）的最初進程。

**作者簡介：**留婷婷，台灣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sup>①</sup> 雲惟利：〈十年來之澳門文學〉，李觀鼎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24頁。

上述的年份與事件，對於澳門文學的詩、散文、小說等文類與各文類研究來說，自然都具備相當程度的重要性。之所以獨舉散文，是因為相較於詩及小說來說，澳門的散文創作與報紙副刊之間的關係尤其緊密，依附性亦格外顯著。舉凡葉貴寶、葦鳴、黎綺華三位作者出版於1985年的散文合集《三弦》，發行於1990年代的《七星篇》、徐敏《鏡海情懷》、凌稜《有情天地》、凌鈍《一壺濁酒喜相逢》、穆欣欣《戲筆天地間》、林中英《人生大笑能幾回》與《眼色朦朧》等，乃至付梓於21世紀的散文合集《美麗街》、胡悅《娃娃臉》、水月《忘情書》、沈尚青《雌雄同體》、林中英《女聲獨唱》、李爾《有感爾發》、黃文輝的《不要怕，我抒情罷了》與《偽風月談》、冬春軒的《世說新聲》與《鼓柁滄浪》，還有寂然的《青春殘酷物語》等諸多散文著作。其中所收錄的文章，絕大部分或甚至全部，都來自各作者在《澳門日報》與《華僑報》的專欄。

兼擅新詩與散文，也偶有評論文字面世的澳門作家黃文輝便曾談及：“目前被稱為文學作品的澳門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實是報紙副刊作品結集而成，特別是散文，恕我孤陋寡聞，還數不出有哪一本澳門作家的散文集不屬此類”。<sup>①</sup>文本對書籍以外載體的全面依賴，看上去是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卻也是在極為有限的資源與版面之上，既被制約又富有特色的在地現實。幸或不幸的是，三十年來澳門的文壇環境，並未見太大的改善或變化。黃文輝在2000年寫下的文字，在近二十年後的今天，也仍然適用。兩年一度的“澳門文學獎”，一年四本的《澳門筆匯》，都不比每日推陳出新的《澳門日報》來得更具能見度與承載量。詩歌和小說，尚且可以“過大海”——在香港的詩刊和文學雜誌上刊載，也能在台灣舉辦的“時報文學獎”、“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與“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徵選中屢獲佳績，但散文的“越界”，卻是十分困難且少見的。<sup>②</sup>於此同時，在筆者目前所搜集到的百餘條澳門現代散文研究與評論篇目中，幾乎只能找到寥寥幾篇，是與報刊載體並無直接聯繫的。這便意味着，報紙副刊與專欄載體的影響力，已從創作的源頭開始，無聲無息且無遠弗屆地滲透到了研究的後端。

舞台的基礎搭建完畢，澳門散文創作與研究的特殊路徑也大致梳理結束，接下來，便要正式進入回顧與對話的環節。本文所回顧的前行研究，將以刊載或發表於澳門本地者為主，港台及中國學界的論述成果輔之。在隨後的三個章節中，筆者將先按照格式、篇幅與評述對象的範圍大小，將澳門現代散文研究的前行文獻，分為“史論”、“專論”及“書評”三類，對其中的重要篇目進行串連、引介與論述。史論部分將偏重文學史觀的歷時性爬梳，旁及學術倫理問題與理論自覺。專論部分則以受研究者青眼有加的兩項議題作為主軸，即“澳門女性散文的書寫特色及性別意識”與“副刊場域之於澳門散文的權力網絡”，既釐清各方論點的起源與導向，也揭示後續對話的可能。最後，書評是散文創作的延伸，亦是與之關係最密切者。以報刊雜誌為主要據點的大眾書評，一方面和充斥着學術菁英的研究場域，形成抗衡、合謀又共生的態勢，另一方面，則因論述的自由和篇幅的彈性，而孕育了迄今為止唯一一場以散文為中心的文學論爭，即“澳門文學主流”之辯。<sup>③</sup>從史論、專論到書評，通過脈絡化三方的關聯性，筆者將試圖指出複數框架之存在與多維批評（multi-directional critique）視野之可能，並以此作為全文的總結。

① 黃文輝：《字裡行間——澳門文學閱讀記》，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5年，第51頁。

② 以詩打開地域的隔閡，並被邀請書寫台灣“三少四壯集”專欄，最終更於台灣出版隨筆集《喧鬧的島嶼》（2018）的袁紹珊，是難能可貴的一個特例。

③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7—29頁。

## 二、澳門現代散文研究回顧（I）：史論始終

澳門現代散文研究的篇目，以書評居多，專論次之，史論則敬陪末座。這三個分類是以格式、篇幅、所處理對象的量體大小作為標準，進行綜合考量及劃分。然而，此分類是相對性而非絕對性的，故存在重疊的地帶和越界之可能。書評輕薄短小，多以一位作家或一本作品作為切入點，內容以抒情感懷為主，夾敘夾議為輔，行文並無規限，大多頗具彈性，也有文字實驗的自由。專論則正好相反，是行文邏輯分明、格式嚴謹、篇幅一般在萬字左右的學術論文，包括專書論文、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此外，1984年由《澳門日報》主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以及1986年東亞大學舉辦的“澳門文學座談會”，皆是相對正式的學術對話場合，不僅具有不可忽視的象徵性意義，對後續的研究進程亦影響深遠，故這兩次座談會的發言紀錄與所發表之文章，皆以專論視之。

史論則顧名思義，是與歷史相關的論述。簡而言之，便是有關澳門現代散文史的研究產出。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掀起了對港澳的“回歸熱”，著述了大量的導論、概論與文學史書籍。但正如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劉景松所言，“早期關於澳門文學的評論，大都附庸於香港文學。也正是因為搭上了‘港台’文學的順風車，澳門文學才開始示於人前”。<sup>①</sup>然而，即便皆示於人前，中心與邊緣的位階落差卻極為明顯，受到關注與討論的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語。“個別著述關於香港、台灣的章節書寫得八分到位九分精彩，但澳門的章節則不盡如人意”。<sup>②</sup>這裏的“不盡如人意”，不僅在於研究者所使用的文獻資料多已十分陳舊，也在於觀點的粗糙與分析的敷衍：

所述實際內容過於單薄。本就佔極小比例的澳門章節，概述簡介類文字幾乎佔去一半，剩下一半流於“排排隊、分果果”式的處理——各種文體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基本被剔除）、評論，均衡地分別佔一個段落，所論無非“思想內容藝術風格”一類舊聲老調。<sup>③</sup>

劉景松的觀察與批評，也揭示了在看似一片繁華風光的澳門文學研究領域中，諸多論述成果的水份含量之高，以及書寫方式與切入視角的毫無新意。於此同時，他對於文體被“段落化”處理的不滿，以及認為澳門文學的解釋權應當握在澳門作家或文學史家手中的呼籲，這使廖子馨〈澳門的散文創作〉一文的出現，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廖子馨的〈澳門的散文創作〉一文長約三萬字，收錄於中國學者劉登翰所編著的《澳門文學概觀》（1998）一書中。此書雖亦是“回歸熱”時期的產物，但別出心裁地邀請了鄭煒明、陶里、莊文永、施議對、李觀鼎、汪春等生長於澳門，或在此深耕已久的評論家與學者，就彼此熟悉的題材或文類去撰文成篇，爬梳出澳門文學的歷史走向。廖子馨其文分為三節，始之以“充滿社會批判和愛國激情的五六十年代散文”，繼之以“由激進向平實過渡的70年代”，結之以“走向繁榮的八九十年代散文”。<sup>④</sup>誠如文化評論人李觀鼎所精確點明的，廖文“以宏觀史敘的總體框架為主，將分類評點融入其中，這樣便更有‘史’的意味”。<sup>⑤</sup>在其筆下的澳門散文發展史，

① 劉景松：〈文學史視域中的澳門文學——兼論林中英散文的文學價值〉，《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7年第3期，第162頁。

② 劉景松：〈文學史視域中的澳門文學——兼論林中英散文的文學價值〉，《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7年第3期，第164頁。

③ 劉景松：〈文學史視域中的澳門文學——兼論林中英散文的文學價值〉，《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7年第3期，第164頁。

④ 廖子馨：〈澳門的散文創作〉，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169—204頁。

⑤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33頁。



雖受五四運動影響，但變化卻並非立竿見影，1920至30年代所流行的仍然是“在半文言、半白話中摻入廣府方言”的“三及第”文體。到了1950至6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於《學聯報》和《新園地》等有限的發表平台上，澳門的散文寫作受到中國政治局勢與文化氛圍渲染，文章的語調多慷慨激昂，立場多偏向極左意識形態，主題也多是歌頌祖國、反抗殖民與批判社會，“陷入了思想激進、內容貧乏的泥沼”。<sup>①</sup>

但在1960年代的另一時期，文壇也並非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樣板之作。立基於澳門本土，富有生活情趣、現實關懷與知識普及意圖的小品文專欄亦逐漸增加，也奠定了1970年代散文創作的基調，即“擺脫‘激進文學’的影響”。先破而後立，在“放棄過往的浮誇文風”後，<sup>②</sup>作者們開始關注起現實生活的大小細節，從中發掘創作的題材，也通過方言的運用，以及對於底層勞動階級的關懷，而達致藝術技巧與大眾風格的巧妙揉合。徐敏、魯茂、陶里、金中子（即鄧景濱）等第一代澳門散文作家，正是在此時進入讀者的視野之中。汪雲峰的“金牌侍應”，以及麗莎（即沈尚青）的“八妹手記”專欄文章，更融寫實與虛構於一爐，不再受制於文類的既有框架也從而成為了1970年代澳門散文創作領域的代表作品。待到1980至90年代，澳門文壇更呈現百花盛放的景緻。此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在於散文風格的抒情化、視野的本土化、題材的都市化，以及女性創作者與校園生力軍的參與和活躍。林中英、林蕙、玉文、凌鈍、吳聞，以及林玉鳳等其人其作，皆可作為此一時期的標誌。

廖子馨在前乏古人之際，藉由文本的細緻閱讀與歷史事件的詳實考察，建構出相對具體且完整的澳門散文發展史的大致框架。後繼的研究者們，亦多在該範圍內進行作家論、作品分析與議題的論述，而未有能動搖或逸脫出此架構者，即便是澳門文學史的書寫者，亦是如此。饒凡子的《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2008）一書，名為“論稿”，實為文學史，但卻只集中討論了詩歌、小說和土生文學，而不見散文。鄭煒明的《澳門文學史》（2012），則僅以一章處理包含所有文類在內的“澳門現當代華文文學”，故而超過六十年的澳門散文創作歷程，被分配到的篇幅也只有點到為止的數頁。而在中國學者丘峰與汪義生合著的《澳門文學簡史》（2007）中，有關散文的敘述部分散落於各章，合而觀之看似十分全面，但卻是無論所談及的作家、所分析的文本，抑或所抱持之觀點，皆與廖文多有重合之處。<sup>③</sup> 這一方面印證了前述的劉景松之觀點，另一

① 廖子馨：〈澳門的散文創作〉，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169、173頁。

② 廖子馨：〈澳門的散文創作〉，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175—176頁。

③ 如“對於漢恆的寄望，懿靈在〈回應‘尋根與現代’——答‘再創東大文壇新里程’〉（刊於1987年3月24日）表示，‘在不贊同與贊同之間佩服作者的先知先覺和敢言’，不過不認同對方的看法。懿靈指出漢恆的觀點是與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尋根和現代主義’的提出相吻合，而澳門文學是該回應、跟從，還是否定？她主張：‘中國作家所以提出這樣的理論，就是深感走向世界，必先走向中國。因此，若要澳門文學走出區域界限，那必先從尋根開始，向“縱老頭”學習，才可向“橫先生”請教（……）。’”（廖子馨：〈澳門的散文創作〉，第201頁）。與“對漢恆這些有代表性的文學觀念，懿靈在1987年3月24日發表的〈回應‘尋根與現代’——答‘再創東大文壇新里程’〉一文中表示不同的見解。她認為漢恆的文學現代化觀點與時下中國大陸‘新時期文學的尋根和現代主義’的觀點相吻合，但她認為這種觀點並不符合澳門文學的實際情況，澳門應該有澳門的特點。她說：‘中國作家所以提出這樣的理論，就是深感走向世界，必先走向中國。因此，若要澳門文學走出區域界限，那必先從尋根開始，向“縱老頭”學習，才可向“橫先生”請教（……）。’”（丘峰、汪義生著：《澳門文學簡史》，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2—163頁）。粗體是筆者為方便讀者捕捉到兩篇文章的因襲部分而加的。上述兩段於行文邏輯、論點排列，以及引文擷取的部分，幾乎完全一致。《澳門文學簡史》中類似的重合狀況尚有許多，由於並非本文焦點，在此且先按下不表。

方面卻也體現了廖子馨其文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正是在於儘管可能被承襲，卻始終難以被超越。然而，所謂的“難以被超越”之現況，究竟是呈現了文獻搜集困難、既有架構牢不可摧等客觀事實，抑或只是研究者的疏懶所致？這是我們無可逃避的一則自問。

### 三、澳門現代散文研究回顧（II）：專論、女性與副刊

將鄧景濱的〈一九八五年的澳門散文〉（1988）與荒林的〈免濾的生命表達——2009年澳門散文創作評述〉（2012），分置於歷史光譜的兩端，近三十年間澳門散文創作的刊載媒介、作家指向與作品風格的變與不變，便次第浮現眼前。身兼學者及作家的鄧景濱，在1986年的歷史現場，寫下“澳門的散文，無論在園地、作者、作品諸方面，均居澳門文壇的首席”。其一方面“以面的形式，從量的角度”，一一細數當年澳門散文的諸多發表場域，像是《澳門日報》、《華僑報》、《大眾報》與《市民日報》等報紙副刊與專欄，還有《恆升》、《青鳥》、《澳門學生》和《浪花》等校園刊物，以及“國際青年徵文比賽”與“澳門青年文學獎”等徵文活動。另一方面，則“以點的形式，從質的角度”，將該年度的創作產出分為“議論散文”、“抒懷散文”及“現代派散文”三類，並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即充滿“匕首投槍”精神的雜文家東方一羽、情景交融且文風成熟的凌稜、字詞精煉富有詩意的玉文，以及書寫手法獨具一格、有別於傳統的陶里——進行聚焦評述與文本分析。<sup>①</sup>

誠如評論者李觀鼎所述，鄧文的類別劃分尚有可議之處，“因為從邏輯上看，這三者的分類標準並不一致，‘現代派’是一個流派的稱號，而‘抒懷’和‘議論’則指寫作方式”。<sup>②</sup>又或者說，“抒懷”和“議論”可以指向散文的不同類型，但“現代派”卻是適用於各種藝術領域和文類的創作手法，故而三者的立場並不對等。無論如何，鄧景濱都敏銳地察覺到了1980年代澳門散文的發表場域、書寫方式和風格的多元。然而，到了二十多年後，在荒林的筆下，2009年的澳門散文創作評述，卻是收束了刊載媒介的多方位指向，僅餘報紙副刊，尤其是《澳門日報》獨佔鰲頭。另一方面，既剔除了現代主義的可能，也看不見充滿批判精神的議論雜文之發展。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也沒有步行在魯迅和周作人等人開創的表達現代思想和個性的新散文道路上”，唯有抒情作品感懷人心，而且是一種“未經過理論的熏染，也拒絕了意識形態的過濾”之抒情。具體而言，是“宏大命題進入私人收藏空間”的書寫傾向，將歷史事件放進個人生命史裏進行觀照，以林中英的“回歸”紀事、穆欣欣的家族敘事、文戈的庶民美食回憶，以及馮傾城、區仲桃對於葡萄牙殖民遺緒的反思，作為此中代表。<sup>③</sup>

從鄧景濱到荒林的論述歷程，不只是創作史的，更是學術史的。在迄今可見的所有澳門散文研究專論中，討論女性作家作品與報紙副刊場域的篇目，大約各佔一半，除此之外的論文主題幾乎難以見得。即便是看似不太相關的陳少華〈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散文中的本土意識〉（2006）、程祥徽〈澳門文學格局中的序文〉（2011），與曹明的〈讓更多人了解澳門的歷史、

① 金中子（即鄧景濱）：〈一九八五年的澳門散文〉，蘆荻等著：《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年，第45、47、48頁。

②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31頁。

③ 荒林：〈免濾的生命表達——2009年澳門散文創作評述〉，朱壽桐、黎湘萍主編：《近現當代傳媒與澳港台文學經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0、59頁。

文化和社會——讀《陳煒恆文存》札記》（2017）等篇，亦是在專欄成書、後有序跋的基礎之上，進行文本分析與討論。

對於澳門女性散文作品的學術性討論，始於廖子馨的碩士論文〈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即收錄在與其他評論文章一同整理出版的《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1994）一書中，與書名相同的〈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一篇。廖子馨不只是澳門文學的實踐者，也是本地散文發展史與女性議題研究的第一人，被其指導教授饒凡子盛讚為“澳門半島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sup>①</sup>概括而言，這篇論文以“女性文學”的定義作為起點，引介了孕育澳門女性作家的時空背景，接着進入作家論與作品分析，最後則探討了地緣的影響論，將中國與澳門、台灣與澳門，以及香港與澳門之間的關係和差異，在女性創作的尺度範圍內一一釐清。然而，在“女性文學”的定義方面，廖子馨僅統整了學術界有狹有廣的各種觀點，卻未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樣地，時空背景的介紹與後續的作家論之間缺乏關聯，對於作品的分析，也往往顯現出一種弔詭的性別決定論與本質論，諸如“體現女性文學的特點”、“表現出完全的女性感知”、“是傳統的女性文學題材”等用語，以及“一個女人總要先經歷女兒性階段，再進入妻性角色，最後實現母性角色”且“女作家創作的成功性來源於她對三個階段的女性角色能準確把握”，<sup>②</sup>如此等等。不僅把女性身份的諸般可能大幅限縮至家庭之內，也將原本必須被問題化的性別概念與既有的刻板印象，視為無庸置疑的論述前提。“因是‘第一個’，所以難得，也因是‘第一個’，有些地方疏落和不足就在所難免”<sup>③</sup>——饒凡子持平而含蓄的話語，是對此篇開荒之作最為貼切的評價。

承接其後的，有于平的〈凌稜的“第六天性”——《有情天地》“情”之解析〉（1999）、盛英的〈一片冰心在玉壺——漫話澳門女性散文〉（1999）和〈雲破月來花弄影——澳門女性散文一瞥〉（2000）、荒林的〈人類之思與女性之聲——澳門女作家林中英散文集《女聲獨唱》欣賞〉（2013）和〈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女性主義寫作——澳門女作家林中英創作論〉（2013），以及劉景松的〈文學史視域中的澳門文學——兼論林中英散文的文學價值〉（2017）等多篇論文，皆以澳門女性散文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多聚焦於凌稜、林中英、沈尚青、胡悅、林玉鳳、馮傾城等已小有名氣，並且已出版個人散文集的女性作家；所論方向則以書寫風格、敘事手法，以及所呈現之現實關懷等面向為主。各篇的論述方式多樣，雖則部分觀點有當下時空的侷限，也雖則未能挖掘出已知文本之外的新作品，但在舊有的基礎之上，仍不乏新穎觀點的提出以及嶄新情報的掌握。像是劉景松那篇極具野心和策略性的論文，以“開創出其更多的潛在價值，增加其在文學史中的厚重度”作為指導原則，<sup>④</sup>挖掘出了林中英作品中小說筆法、美文修辭與雜文文體之間的融合，以及學院派作家與大眾媒介之間的張力。也像是荒林在與作家進行深度訪談之後，將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背景資料，與文學地理學的理论架構相結合，從而鉅細靡遺地勾勒出了“女作家”的建構史，也有力地反駁了既有的性別本質論。

① 饒凡子：〈她的人和她的文（代序）〉，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第III頁。

② 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第25—27、31頁。

③ 饒凡子：〈她的人和她的文（代序）〉，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第III頁。

④ 劉景松：〈文學史視域中的澳門文學——兼論林中英散文的文學價值〉，《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7年第3期，第166頁。



此外，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堂錡的〈澳門女性散文的抒情傳統與批判意識〉（2018）一文，更將澳門女性散文缺乏批判意識的緣由，與報刊載體的框限連結在一起。他認為在溫和的倫理教化、密切的人情網絡，以及文學被邊緣化的無力感之外，報紙專欄在客觀條件下的字數限制，“會在創作思維上形成一種無形的制約”，也從而導致“很難在這些零碎、短小的作品中有大氣的展現”，<sup>①</sup>也就難以增加藝術的深度和思考的廣度，更難以產出具有真正影響力和重要性的作品。對於澳門的散文創作日復一日地受制於報刊權力網絡的現實局面，作家們亦非毫無警覺。林中英認為專欄寫作是培養惰性的“雙面刃”，<sup>②</sup>廖子馨指出“因着篇幅和讀者面，框框文學無法推動區域文學進一步健康壯大”，<sup>③</sup>黃文輝則強調“世上沒有完全中立的報紙，也沒有毫無立場的報館”，因而“報紙副刊既塑造了目前澳門文學的主體風格，又束縛了澳門文學風格往更多元化方向發展”。<sup>④</sup>更甚者，商品化、消費性的報刊版面，不只框限了文字的篇幅與內容，更磨損了作者的熱情與想像力的額度：

“專欄”作品的一種隱晦的公共風格通常是：貼近生活、直抒胸臆，文風瑣碎、下筆草率。當某種公共風格趨於明朗時，也就意味着它正在抹去私人寫作的隱密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個性的遮蔽無疑意味着卓越品質的晦暗。事實上，當寫作變得過於隨意時，它消解的正是作者意圖中的真實品格：當寫作者無暇深入思索時，那些習以為常的內容和經驗之談，除了表明一種平行紀錄現在生活的準真實性外，又如何能為現實開啟新的維度？<sup>⑤</sup>

內地學者蔡江珍切中肯綮的論述，將報紙副刊對於澳門散文的影響這一議題，推入了嶄新的維度之中。這已不只是單一文類未來該如何發展的問題，而是公共風格與私人風格、大眾讀者與個體寫作者、真實和虛構之間的潛在衝突，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下、普世性的文學命題。

然而，即便有所警惕，也即便已提出批判與呼籲，但要如何改變長久以來的被動局面，又要如何解套當下的困境，卻仍然是個未解之謎。與副刊場域相關的論文，尚有蔡江珍的〈報紙副刊與澳門散文〉（2002）、張劍樺的〈澳門散文發展史略〉（2010）、魏斌的〈近十年的《澳門日報》副刊與女性散文〉（2014），以及戎琦的〈澳門文學生態與“冬春軒體”的生成〉（2014）等篇。此外，還有王列耀與龍揚志兩位學者，以十年作為考察區間，抽絲剝繭而成的《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2014）一書。王列耀與龍揚志認為，副刊對澳門文學的塑造，主要在於“鞏固、培養了澳門文學作者和讀者群”、“引領、規約了澳門文學體裁、題材與主題的發展變革”和“見證、推動了澳門文學觀念的更替”這三方面，<sup>⑥</sup>但文學對於傳媒的影響，卻是相對地次要和弱小：

生產機制之所以能夠產生規模效應，是因為制度具有重建秩序的話語權威，對於文學作品來說，發表意味着被制度審核與評估體系認可，為了達到這一基本目的，文學創

① 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第76—77頁。

② 林中英：〈托身大眾傳媒的澳門散文〉，《澳門日報》（澳門）2000年2月16日，鏡海版。

③ 廖子馨：〈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2000年第1期，第12頁。

④ 黃文輝：《字裡行間——澳門文學閱讀記》，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5年，第53頁。

⑤ 蔡江珍：〈在尋常中追索新的可能——澳門近年散文隨感〉，《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2000年第1期，第50頁。

⑥ 王列耀、龍揚志：《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0—66頁。

作首先需要體現出對制度的敬畏，而不是對文學自身的思考。按報紙副刊的要求控制篇幅，注意雅俗共享，看起來是作者與編輯因默契而達成的契約關係，在這樣一種看似合理的標準面前，作家實際上交出了文學的藝術個性來兌換制度的認可。<sup>①</sup>

只要由消費文化主導的市場機制尚且存在，只要多元文學場域尚未出現，苦悶與失去自主性的局面就不會有終結的一天。但在另一方面，散文卻也可以是大於報紙副刊的一種抽象性的存在——“散文永遠是一種具有無限可能的文體，宏大與微小、真實與幻想、冥想的嚴肅與遊戲的輕鬆，無所不包”。<sup>②</sup>畢竟，這恰恰就是散文這一文類易於被塑形、箝制，從而成為共謀之緣由，卻也正是其無法被取代的魅力所在。

#### 四、澳門現代散文研究回顧（III）：書評之鑑與主流之辯

“言語的特殊激發力不在於詞語和詞語所表述的事件，而在於言說方式本身”。<sup>③</sup>若說散文是最為自由的文體，則書評就是最接近散文的議論形式，甚至其本身，就是廣義的散文定義裏的一種。在本文的論述中，第二節的史論、第三節的專論，與本節的書評之間，最基礎亦最關鍵的相異之處，便在於此。史論是在歷史長流的局外運籌帷幄，進行全面性的考察與再現，故而只能取十年或百年的單位跨度，在恆河沙數的作家作品中擇其一二，也從而只能勾勒出這棟時序博物館的大致藍圖，而無法對所有年代、所有細節皆精雕細琢。專論則具有較高的知識門檻，並以一定的學術訓練和相對嚴謹的格式要求為前提，因此其影響範圍通常只限於學院象牙塔之內，能見度有限，自然也就難被廣泛地接收和普及。相較於上述兩者的厚重冗長，書評的彈性，正在於量體的輕薄與敘事的自由。

在此，書評雖名為“書評”，但其對象不限於一人一書，內容也不止於評。它可以是即將出版的書本之序跋，如李鵬翥的〈悠然情思 雅淡自然——序徐敏的《鏡海情懷》〉（1990）、〈好一個澳門現代徐霞客——序張裕的《世界奇觀背囊遊》〉（1994）和〈哲理情思牽古今——跋鍾子碩的《足迹的幻化》〉（1994）。可以是作家的個性側寫，如陶里的〈凌稜對澳門有獨特情懷〉（1995）、〈為減壓而撒野的凌鈍〉（1995）及〈魯茂千萬字一本書〉（1995）。可以是觀點的承續與對話，如夢子的〈一個是非女人——《一個人影，一把聲音》序言〉（2004），和黃文輝的〈“是非女人”的多種聲音〉（2006）。也可以是文壇現況的反思與觀察，以及創作者的現身說法，諸如林中英的〈澳門女性寫作中的人生風景——讀《七星篇》〉（1998），還有李觀鼎的〈論黃文輝的散文批評〉（2002）、〈論澳門散文史的敘述〉（2002）與〈澳門散文的傾訴性〉（2008）等篇。

於此同時，開放自由投稿的大眾書評，更可以是文壇事件的紀錄者，以及時代脈動的回聲。這一方面體現於所分析作品的“即時性”，像是秦西行的〈“秋葉”的一些不足〉（1986），討

① 王列耀、龍揚志：《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3頁。

② 蔡江珍：〈報紙副刊與澳門散文〉，廖子馨編：《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年，第155頁。

③ 蔡江珍：〈報紙副刊與澳門散文〉，廖子馨編：《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年，第154頁。



論的便是1985年由《華僑報》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獎”之散文得獎作品；而陳義的〈論“下班”節奏之構成因素〉（1988），則是在作家凌鈍的散文集《一壺濁酒喜相逢》（1993）尚未付梓之前，針對其中已發表在報刊上的一篇文章，去進行敘事策略的分析與評述。另一方面，這種歷史現場的臨場感，亦以文字作為載體，通過作家間的追憶溯往，將澳門文壇交際往來的人情網絡，具體而細微地呈現了出來。像是林中英的〈魯茂是誰？〉（1990）寫師生情誼，徐敏的〈陶里散文蘊藉凝重——《靜寂的延續》讀後感〉（1986）與陶里的〈徐敏跟澳門苦樂與共〉（1995），則拉出一條長達十餘年的“以文會友”之線索，也展現了兩位作家相互砥礪成長的好交情。

除此之外，書評與散文創作的類同之處，還在於兩者幾乎都是先在報刊上發表，隨後才收錄成冊出版。換句話說，散文寫作者將文章產出之後，會先送至報社刊出，待文章的數量到達一定程度之後，便在出版社的協助之下發行成書，爾後書本的序跋或評論，也會在報紙副刊上刊載。這樣一來，這些序跋名家與評論者也將成為積稿的主語，重演一趟前述的歷程。莊文永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文學評論集》（1994）、陶里的《從作品到澳門作家》（1995）、李鵬翥《濠江文譚新編》（1999），以及黃文輝的《字裡行間——澳門文學閱讀記》（2005），皆是依此脈絡而成。澳門散文的生產與消費、評論與典律化，自始至終的每一個環節，都與副刊場域的權力網絡關係匪淺。

書評的一端與創作現場緊密接壤，另一端則與學術研究形成時而互別苗頭、偶有對立，時而彼此啟發、合作互助之勢。像是在女性作家作品的成軍方面，金中子、李鵬翥、陶里與莊文永等人，比之後繼的澳門文學研究者，更早觀察到女性散文已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且對此多有著墨與評介。又如同在副刊場域的討論部分，廖子馨發表於1997年的“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寥寥數頁的〈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一文，與蔡江珍的長篇專論〈報紙副刊與澳門散文〉，還有林中英的〈托身大眾傳媒的澳門散文〉（2000）、黃文輝的〈胡悅胡閱——兼論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之關係〉（2000）這兩篇刊載於《澳門日報》的書評，幾乎是在世紀之交同時出現，不但篇名多有重合，各篇章的對話關係亦頗為明確。然而，當我們幾乎要因為許多同時出現在大眾副刊版面和學術研究場合的姓名、議題和觀點，而有點暈頭轉向，欲將書評與專論間的類別分野一筆勾銷時，黃文輝卻又極為明確地劃清了界線：

澳門文學誠然是沒多少人關注，或用大部分人都同意的一個詞來形容：處在“邊緣”位置，但澳門的作者並沒有因此自憐自怨，反倒是自尊自強，創作不輟，量不多，但依然堅持。我們不怕沒有人評論，畢竟，大伙兒拿起筆來寫作的初衷都不是為名為利，但我們，起碼我，最怕那些以高高在上姿態來指手畫腳胡亂評論的所謂研究者。<sup>①</sup>

與作家作品呼吸着相同的空氣，自己也在其間創作着，並細微而具體地推動着文學史進程的諸多大眾書評書寫者，以及相較之下或許行文艱澀、理論高深，但始終沒有那麼“接地氣”的“所謂研究者”。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僅確切存在、須被堅持，且有堅持之必要。畢竟反思自我的起點，往往都因意識到“他者”的存在。這也讓我們意識到，面對所有田野，都不卑不亢、心懷虔誠，是再應該不過的事。

<sup>①</sup> 黃文輝：〈澳門文學的豐饒與豐滿——讀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澳門筆匯》（澳門）2019年3月第68期，第54頁。

在大眾書評與學術論文的交會歷程中，尚產生了迄今為止唯一一場、以澳門散文定位為核心的文學論爭，即李觀鼎在《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一書中紀錄的“澳門文學主流”之辯。<sup>①</sup>事緣於1992年1月至3月間，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的緣源，將其學士學位論文〈澳門文學現狀窺探〉投稿至《澳門日報》，並獲得“鏡海版”上長達三個月、共計五次的分段刊出之版面。且不久後的同年9月，該文又被轉載至《澳門筆匯》文學雜誌。緣源在文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迄今為止的澳門文學成果是“散文最豐、成績最大，詩歌次之，小說較弱，評論最薄弱”，<sup>②</sup>這一遞減式的名次順位引起了爭議。齊思（即鄧駿捷）在1993年2月刊出的〈談澳門文學主流〉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強調“散文最豐”的看法尚可以接受，但“成績最大，詩歌次之”的部分卻使人無法苟同。齊思通過作品結集的數量、文類專屬刊物及社團的有無、外地學者評論澳門文學時的文類聚焦點，以及緣源在文中大段引述、但並未附上出處的前行研究之全貌，來一一反駁其觀點。對此，廖子馨於3月時發表〈“澳門文學主流”異議〉一文予以回應，指出齊思的論述亦有可議之處，因外地學者的評論往往只是“閱讀少量澳門作家作品之後所做的分析或總結，並不能作為對澳門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創作全貌的整體性判定”，<sup>③</sup>且澳門文學還在起步之中，爭論主流問題為時尚早。因此，即便廖子馨個人亦認為，散文的創作量、讀者面和接受程度，確實在其他文類之上，但不會“據此斷言散文是澳門文學主流，因為沒有必要”。<sup>④</sup>

1993年6月，齊思以“再談澳門文學主流”為題，撰文回覆廖子馨之質疑，主張“所謂主流，是相對的，而非絕對”。<sup>⑤</sup>齊文一方面重申在當下語境中談論此議題並無不妥，反而能夠促進澳門文學評論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則再次強調詩歌的創作成就在散文之上，更寫下“我相信要非長於詩歌創作的作家，接受我的觀點，是可能有心理上的障礙”之話語，<sup>⑥</sup>隱然拉出了新詩和散文，乃至詩人（齊思／鄧駿捷）和散文家（廖子馨／廖子馨）之間針鋒相對的態勢。在日後回顧兩人文章時，李觀鼎認為，“廖子馨以謹慎的態度將一種歷史眼光引入這一問題的思考是十分難得的”，但齊思的論點卻“並無甚麼新意”，<sup>⑦</sup>顯見其相對而言，亦更認同前者的看法。

澳門文學的主流之爭，並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將陣地轉移至學術界，以單向陳述的方式取代複數對話，繼續出現在學者的筆下與澳門文學研究的論文中。雲惟利談1980年代的澳門文學，認為“若論作品數量，小品文實比詩更多。然就整體而論，則比詩略為遜色”。<sup>⑧</sup>同樣是探討80至90年代的創作情況，鄭煒明則承繼了齊思的觀點，強調“無論從質和量（以已經結集成書的來

①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7頁。

② 緣源：〈澳門文學現狀窺探〉，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04頁。

③ 廖子馨：〈“澳門文學主流”異議〉，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18頁。

④ 廖子馨：〈“澳門文學主流”異議〉，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19頁。

⑤ 齊思：〈再談澳門文學主流〉，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20頁。

⑥ 齊思：〈再談澳門文學主流〉，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23頁。

⑦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8—29頁。

⑧ 雲惟利：〈十年來之澳門文學〉，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37頁。

算)方面看,澳門的現代詩,成就都比散文有過之而無不及”。<sup>①</sup>而在1999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的“澳門文學叢書”裏,身為編委會一員的陶里,在前言的概說中,直言“散文是澳門文學的主流。被視為文學基地的報紙副刊,散文是陣容鼎盛,人強馬壯,旗幟鮮明的勁旅”,<sup>②</sup>此說法亦為後繼的陳少華、王列耀、龍揚志等學者所廣泛接受及引用,至今亦然。張堂錡在其出版於2018年的《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一書裏,那篇探討澳門女性散文的論文中,更開宗明義地指出,自1980年代開始,“澳門散文就一直是澳門文壇的主流創作文體”,且“儘管新詩的藝術表現也十分出色,但要論創作的質量並豐,陣容壯盛、兵強馬壯的散文應該才是澳門文學發展的中堅力量”。<sup>③</sup>至此,一種主流、各自表述的風潮,雖是隱而不顯,卻也具體而微地從大眾書評的場域掀起,幽靈般縈繞在學術領域的上空,貫穿了這近三十年來的澳門散文研究。

## 五、結語：在中心的框架之外

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則可掌握過去。在澳門散文研究過往三十年的回顧歷程中,我們看見了以廖子馨為始、為代表、為高峰,卻也以為之為終的史論部分的後繼無人。我們看見了大眾書評一度引領的“主流”風潮、對問題意識的敏銳自覺,以及在艱難中持續發展的局面,卻看不見學院研究者對此的關注和反思。同樣地,我們雖看見了專論議題的聚焦與思辯的深入,卻尚未讀到有關1980年代以前散文創作的論述,也無法得知《澳門日報》副刊以外的文學場域與作品產出狀況,更難以窺得相對於女性作家群的男性散文創作者,其整體面貌、風格與美學特徵究竟為何。報社的茁壯與一家獨大,框限了寫作者的可能;對於特定議題的大量而重複的關注,則框限了研究者的可能。於此同時,寫作者的框架是外加的,若不改變單聲道的貧瘠現況,便無有掙脫的契機。但研究者的框架,卻是自己選擇的。是自願或非自願地、加諸己身的一道禁制,卻對點亮更多細節、釐清更多重要的問題,毫無幫助。

有鑑於此,筆者認為,華南師範大學陳少華教授的〈多元與共融:澳門文學形象的主體形塑——以1995—2005年澳門文學獎作品為例〉(2013)、北京師範大學傅天虹教授的〈澳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文學景象與研究意義〉(2010),以及台灣清華大學台文所陳建忠教授的〈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2014)等論文,皆可以作為方法學和題材的借鑑,讓我們去想像以及探索,澳門散文研究領域的諸多未知性。雖然本文篇幅有限,文獻回顧勢必掛一漏萬,所謂未知之境地,說不定也早已被涉足。但筆者仍然相信,試着去理解更多、填補更多,這不僅是回溯歷史的意義所在,亦正是我們理應謀求的未來所在。

[特約編輯 張堂錡;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鄭煒明:〈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華文文學〉,李觀鼎主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55頁。

② 陶里:〈澳門文學叢書概說〉,穆欣欣:《戲筆天地間》,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

③ 張堂錡:《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第57頁。